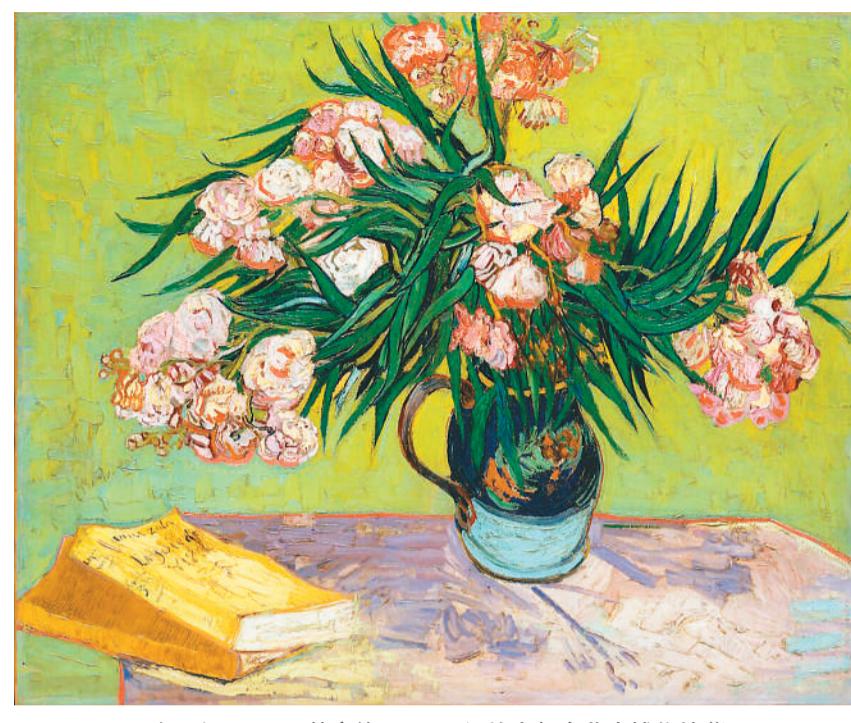


# 陆上之舟

苏沧桑



夹竹桃

梵高绘

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

想要趋近的一种状态。

## 二

走下书店的镂空铁花旋转楼梯时，我仔细看了看扶手的图案，这是一个店员的父亲亲手描绘的。而书店里的另一个楼梯，是从厦门鼓浪屿的老别墅里淘来的；脚下的木地板，则来自上海和天津；那扇通往玄关的老木门，也有100多岁了。

我注意到，陆上书店无论是公共空间还是独立空间，每一个角落都被主人虔诚以待，每一件家具、藏品，都从不同时空远道而来，每一本书，都被精心挑选、陈列，静候属于它们的知音。

物理学上，绝对零度是-273.15℃，是现实中无法达到的温度，就像任何事物永远无法达到完美。然而，正是与绝对零度之间“差一点点”的距离，让人类在不断探索中发现了藏在其中的无限可能。陆上书店便是一个不断趋向完美的空间，像一棵大树，一直在生长着。

我和几位作家一起，与南昌的读者朋友作文学交流。期间，我注意到，自始至终有轻柔的钢琴声伴随着我们的交谈。在观众席的右侧，一位黑衣中年男子坐在一架三角钢琴前，微闭

双目，沉静如敦煌壁画里的乐僧。没有固定的乐曲，他即兴弹奏着，在流水般的琴声里，我的思绪溯游至离此地近2万公里的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古老咖啡馆。在那里，一切仿佛都来自时间深处，桌椅、灯具、书籍、唱片，还有那些窃窃私语的人们。在那里，我遇到了时间深处的一位老人，双目失明的阿根廷文豪豪尔赫·路易斯·博尔赫斯，他常常坐在这家咖啡馆一个角落里口授他的作品，他说：“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。”

此刻，深夜零点。三角钢琴前的黑衣中年男子——陆上书店主人老周的指尖又一次触到琴键时，他所在的整个空间仿佛忽然失重，那些白日里沉默的古董家具、书籍，像被施了魔法，在琴声中一一苏醒。

像往常一样，当书店最后一个客人、最后一位员工离开后，老周总要在书店多坐片刻，独享属于他的时光。当他坐在那架古老的钢琴前，仿佛《海上钢琴师》里的1900终于回到了他的船上。琴声是他与世界对话的语言，漂浮的椅子是聆听的观众，书籍在琴声中舒展开了它们的灵魂。

打造个性化的美学空间，是每一个书店、民宿、咖啡吧主人的初衷。出生于南昌音乐世家的老周，海外归来后，将陆上书店当成了父亲和自己双重梦想的延伸，当成了自己对故乡

的情感表达。有时候不弹钢琴，在这里走走那里看看，或开一盏灯，在一个角落里坐很久，便觉得很幸福。

点上一支烟，他能闻到遥山万寿宫的香火、贡院考篮里的墨香；听见绳金塔的铜铃坠入东湖湖心，听见澹台灭明在钟陵山结草为庐，设坛讲学，播下儒学的种子。他也会听见百花洲杏花楼传出的琴音，汤显祖吟诵“大好年光与湖色，一尊风雨杏花楼”；听见名士徐孺子与陈蕃榻前长谈，清风掠过水面；听见99年前南昌起义的那一声惊世枪响，革命者踏过石板路的回响，在水面折射出崭新的天光。

他深知，书店是有灵魂的，它懂得运营者的情怀，更懂得书店每一个“船员”对它的热爱。那些热爱音乐、书籍及一切美好事物的年轻人，把书店的事当成自家的事，每一周都会读一本书。它懂，因此它也会越来越好。

此刻，深夜零点，我在书桌上的一个留言本上写道：陆上书店，旧时光，慢时光，好品味，好意味。

## 三

七个月大的女婴涵涵睁开眼睛。一幅油画静静靠在墙角，巨大的红黄色块在一缕阳光里燃烧。

此时的她无法感知这幅油画着色的大胆，更无法读懂它的美和表达。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外婆、舅舅、父亲和母亲，都是陆上书店的缔造者。此时的她还不知道，外面的世界有多大，等她学会了走路，她便能走出书店，走向更广阔的烟火人间。她会看到豫章故郡的明月，照见无数南迁衣冠在此系舟登岸，她会看到王勃、王安石、苏东坡、黄庭坚相继登阁，吟诗作对，流传千古的《滕王阁序》和那句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在暮色中尽显辽阔，她会看到灌婴城夯土落下时惊起的白鹭，也会看到尘封多年的章江晓渡重建竣工，成为展现豫章大地江河文化的崭新窗口。

古今交融的文化印记，是陆上书店的魅力，也是古城南昌的魅力，从滕王阁的千年文脉，到陆上书店的现代表达；从章江晓渡的古朴石阶，到东湖意库、大士院街区、蛤蟆街夜市的脱胎换骨，古城的烟火从不拘泥于单一形式，而是在古今交融中不断刷新着美的质地。

此时此刻，一身正装的读者小熊按亮了写字楼里的电梯按钮。老周正忙着10天后在书店举行的芬兰爵士音乐会。新一代书店传承人涵涵发出了响亮的咿呀呀呀声。

这艘陆上之舟时刻等待有人推门而入，在此校准心灵罗盘，重返生活的汪洋。

多去年囤积的稻草，生产队专门用来喂牛，草垛是我们这帮孩子的乐园。

原来，黑皮下午就去找了大发寿，商定了用他爸的皮鞋换200个桃子。他先给了大发寿一只鞋，拿到了50个桃。约好给完200个桃后，再将另一只鞋给他。

不料没过几天，大发寿的父母将桃摘去卖了，总共只兑现了120个桃。后来这事被我们逐渐淡忘。转眼到了冬天，突然有一天，黑皮的母亲整理衣物、准备冬衣的时候，发现丈夫的皮鞋只剩一只，找了两天都没找到，最后只好遗憾地将那只鞋扔了。而大发寿也自此始终只有一只皮鞋。

与我和黑皮玩得最好的还有一个朋友，乳名叫保桩，是家中“幺儿”，很受宠。他的父母老来得子，总是“宝啊”“宝”地喊他，于是我们也管他叫“宝”。他家院外有一棵桑树，每年桑果成熟时都看得很紧，只有我和黑皮去，才会被允许上树采桑果吃。后来，宝去了警校，我和黑皮则又在临沧一中相遇。

中考那年，我和黑皮同时被当时还是中专的临沧师范录取，但我俩不约而同地选择去上高中。

高中时期，我和黑皮没有太多交集，朋友圈也发生了变化，印象最深的是我曾帮黑皮修改过情书。我和他在座位上写啊写，写了撕，撕了又写，临下晚自习时急匆匆往前走，假装不经意地把情书放在女生的桌上，然后冲到大门口等着。

黑皮与那位女生最终没走到一起。有人开玩笑问他：“你女朋友呢？”他就说：“那远外处去了。”意思是他没有女朋友了。高考那年，受电视剧的影响，黑皮铁了心学要法律。后来，他成为了我们老家恢复高考后第一个法律专业的本科生。

如今，每次我和黑皮聊天，说起童年往事、回忆当年上学的艰苦时，总会不约而同地感慨万千。

# 寻根

胡赛标

“胡老师，你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心情。”

过去的2025年，我印象最深的是新加坡胡爱华女士这句话。我懂，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2025年，因为我继续帮助海外宗亲寻根寻亲，显得不同寻常。

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是著名侨乡，尤其是下洋镇，现有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十余万人，有“龙岩华侨看永定，永定华侨看下洋”之称。爱国侨领胡文虎、马来西亚锡矿大王胡子春等人的祖籍均是下洋镇。身为下洋人，十几年来，我一直帮助海外宗亲寻根寻亲。

我并不认识胡女士。一天，我突然接到新加坡永定会馆秘书的微信电话：她收到胡女士的求助邮件，希望能帮助寻找她的曾祖父Oh Ah Min（胡亚明或胡阿民）的祖籍。胡女士在我的视频号里“私信”交流。她说她不懂华文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那么交流呢？我也不懂英文啊。她把我的发的汉字，用聊天软件进行翻译，大概可以看懂意思。

她告诉我她家族的许多故事。她是一位全职妈妈，从未见过她的曾祖父、祖父。祖父胡吉源去世时，她的父亲才两岁。祖父有三兄弟，性格各异，都是读英文的，只有英文名字：Oh Keat Guan、Oh Keat Kheng等，翻译过来是：胡吉源、胡吉庆、胡吉良。译音的不确定性，给寻根增添了不少困难。

此前，胡女士查阅了新加坡图书馆100多份英文报纸，没有找到线索。我手边有一本厚厚的《永定胡氏族谱》，里面的人名有几十万个，如果不能缩小范围寻找，无异于大海捞针，因而需要她提供更多一点线索，比如村庄、亲房、字辈等。她告诉我：曾祖父胡亚明与胡子春关系密切，曾担任胡子春的全权代理、马来西亚槟城中华总商会创会委员，胡吉良举办婚礼正是在胡子春的住所。我一听，觉得这应该不难找，但仔细查阅胡子春一房的世系表后，根本没有胡亚明的名字。

其实，胡女士前期一直在寻找曾祖父的身世来历。她的堂兄去世后，家人们分享了家族故事，激起了她寻根的想法。听说曾祖父与胡文虎有“亲戚”关系，从查阅的英文报纸报道来看，曾祖父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人物，故而她更想查明曾祖父是谁、自己是谁？从哪里来？她给马来西亚槟城、霹雳等地的会馆发去邮件，大多石沉大海，只有新加坡永定会馆给她回复。

“胡亚明”“胡亚明”……连续几日，我的脑中一直盘旋着这个名字。我放弃午休，走访电话，托人用电脑搜索，希望找到他的字或号，始终杳然无迹。我请胡女士去槟城中华总商会找找中文报纸，确定Oh Ah Min的中文名字。她没去槟城，而是先根据新加坡一位研究者的建议，在新加坡图书馆翻看族谱。然而，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到线索。连她注意辨认的“亚”字都没有，差点为此“烧”坏了脑子。

有一天，她发来一则“宗圣公辈分诗”：“德起文章华，子启后耀，家传忠孝远，世守礼义长。”难道这是她曾祖父留下的寻根“密码”？她这一房出自下洋镇富川村？因为她的父亲两兄弟名字带有“万”字，而富川村有“宗、序、启、万”字辈。可还是不对，我赶回老家翻阅了几十本民国版族谱，依然没有找到。后来，我才知道“宗圣公辈分诗”并不是她曾祖父的遗物，而是她从网上搜到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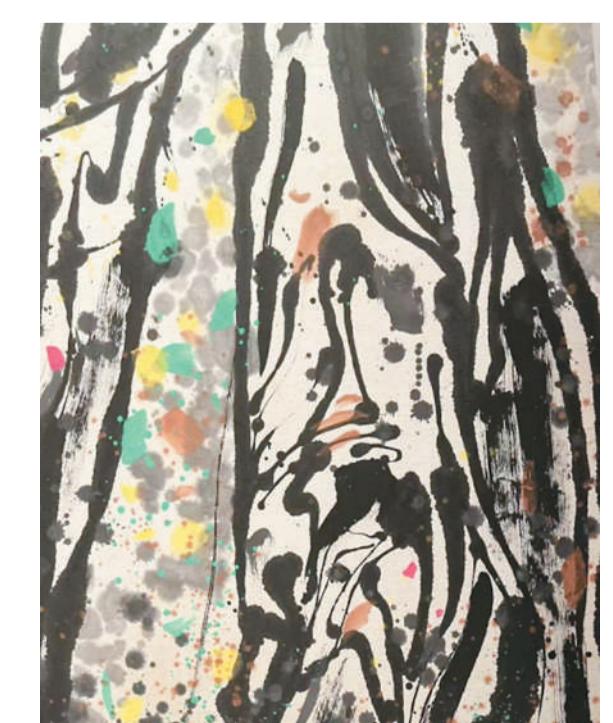
这项“考古”式的寻根，让我身心俱疲。她问我：胡亚明的村子与胡子春、胡文虎的村子，距离近吗？我画了一幅简画给她。有一天，她从网上搜到一个富川村的古墓碑，问我是否可以从这里找到线索。至此，寻根似乎已经走入了一条“死胡同”。

奇迹出现在那天。她忽然来讯说：“老师，我找到他的名字了！胡初梅。可以帮我查你那边的资料吗？”她的喜悦从文字中跃然而出。原来，她搜到一篇论文《槟城中华总商会的设立与背景》，是日本作者筱崎香织写的。她把日文逐页译为英文，去信求证：胡亚明是译音，还是原名？筱崎香织很热心，也很细心，发现胡亚明还有另一个名字叫“胡初梅”。

谜团终于揭开了：在《永定胡氏族谱》下洋镇霞村页面，对上了她曾祖父胡初梅，叔公胡吉庆、胡吉良的名字。我说：“你的祖父‘胡吉源’，族谱里写‘胡吉云’，‘源’与‘云’应该是译音差异。”胡女士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：“是的，我确信四个名字完全吻合，‘源’与‘云’在外国人听来是一样的。我现在才明白，没有中文名字是无法确认的。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我现在的心情……”

随后，我给胡女士发去了霞村牌楼、土楼、宗祠、祖屋的照片，并绘了她这房派直系简图。掐指一算，这段“寻根之旅”整整花了20天。我叮嘱她有空去新加坡永定会馆坐坐。她面露窘色，说道：“我参观永定会馆能说些什么呢？”言语间，她似乎有些社恐。沉寂了一会儿，她接着说：“这次寻根是一次奇妙有趣的旅程，让我内心有种‘回到家’的归属感。”

她是否会去永定会馆，我不确定。我想：最好的寻根或许不是找到族谱直系图，而是走出去与亲人交流感情，将根牢牢地种在心里。



▲根扎南国（局部） 吴冠中绘 中国美术馆藏

## ◎人世间

# 涌宝补录·发小黑皮

马非

黑皮是我的发小。他的父母是云南大理人。

我的老家涌宝，隶属云南省临沧市云县。1954年之前，如今的云南凤庆、云县二县叫凤阳县，隶属大理管辖。

黑皮随父姓段，其母与我同属一个村——当时叫涌宝公社涌宝大队岔河生产队。他的父亲“老段师”是远近闻名的裁缝师傅，还是涌宝缝纫社的社长。黑皮还有个哥哥，在中学做美术老师。

或许是受其兄长的影响，黑皮从小便颇有美术天赋，小学三年级时他还被县文化馆选拔去参加绘画培训班。在我心里，他是神童一样的存在，我一度也想像他一样，将来努力去做一个画家。

那年，生产队在四台地的两株柿子树成熟了。村民们便组织起来，推举年轻后生爬上树将柿子敲下来，然后汇总、称斤。生产队的会计噼里啪啦一通拨算盘，某某家几斤、某某家几斤地分了下去。

由于黑皮家劳动力相对少，分得也相对少一些。黑皮又嘴馋，便想用一个与饭碗大小差不多的塑料调色盘，跟我换柿子。从10个到5个，最后我们以2个柿子的“价格”交换成功。

我有了调色盘，却没能力购置管状的水粉颜料，也没有纸笔，于是调色盘就这样被搁置一边。大约半年后，调色盘因塑料老化开裂了。我为此伤感了好长时间。

我成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云南农村。记忆里，砍柴、挑粪、挖地、讨猪食、割绿叶肥等等都算不上苦和累，只有饥饿最难耐。为了能填饱肚子，我们可谓是绞尽脑汁、煞费苦心。

知道他想要什么就好办了。

当天下午，黑皮找到我，说他已经去找过大寿了，他的确想要一双鞋，如果是一双八成新的42码解放鞋，可以换200个大白桃！

200个呢！黑皮说这话时表情不免有些夸张，馋相一览无余。

可要去哪里弄一双鞋呢？那时我们一年到头也就一双鞋，洗了就得光着脚。我家只有父亲的鞋是39码，已经是最大的了，而且那鞋成天穿他脚上，想都别想。

黑皮一直没有闲着，他发现了他父亲的鞋是41码，更重要的是，他父亲有一双翻毛皮鞋，只有每年冬天才拿出来穿，而尺码正好是42码！

翻毛皮鞋是劳保鞋，当时的市场价格大致是10元钱左右，而一个中学教师月工资也就四五十元——对一个农民来说，其金贵程度可想而知。

突然一天，黑皮捂着衣服来找我，表情有些狡黠。我急忙将他引入我的小屋。他迫不及待地坐到床上，拉开衣襟，顿时，眼前一片白光直晃——白花花的一堆桃！

我们两人饿鬼投胎似的，没多长时间地上便只剩一堆桃核。有了饱腹感便觉得天朗气清，我们满足地捡拾干净桃核，又像销赃的贼似的，一溜烟“飘”出家门，急急忙忙上了乌龟山，连话都不敢说。乌龟山上堆了许

多去年囤积的稻草，生产队专门用来喂牛，草垛是我们这帮孩子的乐园。